

经典启蒙文库

傅斯年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编



Fu Suan JingDian WenCun
Fu Suan JingDian WenCun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C52/9

:3(2)

2008

傅斯年

经 典 启 蒙 文 库

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斯年经典文存/洪治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大学出版社,2008.4

(经典启蒙文库)

ISBN 978-7-81118-236-1

I. 傅… II. 洪… III. 傅斯年(1896~1950)-文集
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6098 号

责任编辑 范维明 封面设计 孙 敏 技术编辑 金 鑫

经典启蒙文库

傅斯年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shangdapress.com> 发行热线 66135110)

出版人:姚铁军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 字数 251 千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6100

ISBN 978-7-81118-236-1/I·069 定价: 20.00 元

前 言

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,傅斯年(1896—1950)是一位在新旧文化、东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杰出学者。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、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,还是“五四”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,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,台湾大学校长。他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之发掘,历时十载,凡十五次,发掘出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,将中国之信史向前推进数百年。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,他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力扫各种障碍,强力推行“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”,并认定“汉、贼不两立”,终将周作人等清除出北大,力彰民族之节气。

1896年3月26日(光绪二十二年),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。傅家家世显赫,祖上傳以漸乃大清第一任状元,荣登清宰辅位。父旭安,光绪二十年举人,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院长。母李氏。傅斯年天资聪颖,博闻强记,虽幼年丧父,但随祖父课读于家,不久即获“神童”之称。1905年春,入东昌府立小学堂。1909年春,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,开始接受新式教育。1913年夏,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当时北京大学预科分甲乙两部:甲部偏重数学及自然科学,乙部偏重文史。傅斯年在乙部学习,成绩优异,为全部第一。

1917年,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文科本科攻读。当时胡适任教北大,提倡白话文,傅斯年受其影响,常与友人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。1918年初,他便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文学革新申义》、《文言合一草议》、《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》等诸文,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。是年夏天,他又约集同学罗家伦、毛准等二十人,在北大创立新潮社,并筹备《新潮》月刊。10月,在《新青年》分别发表《戏剧改良各面观》、《再论戏剧改良》等文,全面呼应胡适的文学改良观。

1919年1月1日,由傅斯年主编的《新潮》月刊正式出版。该刊系《新青年》之后鼓吹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。傅斯年明确地为该刊提出了四项任务:一是“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”;二是为中国人“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”;三是“鼓励学习上之兴趣”;四是使全国学生“去遗传的科举思想,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”,并发表了大量时政及学术文章。“五四”运动发生时,他是积极参与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。是年秋天,傅斯年以出类拔萃的成绩,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。不久,赴英德等国留学,初治心理学和数学,后治哲学,兼治历史、相对论、比较语言学、比较考古学等。

1926年冬,傅斯年由德归国,接受朱家骅先生邀请,任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及国文、历史两学系主任,为学生开设《尚书》、《古代文学史》、《陶渊明诗》、《心理学》等课程。不久,傅斯年又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——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,创办《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》,招收研究生。在《周刊》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里,傅斯年阐明了该所的研究方针:“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,到民众中寻方言,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,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,建设许多的新学问。”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,尤其是由他领导的安阳考古大发掘,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

大量障碍,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。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,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。20世纪初期,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,傅斯年先生占据其二,实为功不可没。

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,傅斯年一方面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,组织社会各界,讨论“书生何以报国”,强化民族意识;另一方面联合众学者撰写《东北史纲》,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,以驳斥日本散播的“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”之谬论。抗战前夕,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,大声疾呼学人“不南迁,不屈服,坚持到最后一分钟”。抗战初期,他不断撰写《天朝——洋奴、万邦协和》、《我替倭奴占了一卦》、《第二战场的前瞻》等评论时局性文字,力举抗日。

与此同时,傅斯年还在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中取得很多重要成果。他以怀疑开道,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,先后发表了《大东小东说》、《论所谓五等爵》、《夷夏东西说》、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、《考古学的新方法》、《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》等重要论文,并撰写了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》、《诗经讲义稿》、《史记研究》、《史学方法导论》、《战国子家叙论》、《性命古训辩证》等一系列重要专著。在这些著述中,他对商周史、古代民族史、古代思想史、古代学术史、先秦诸子、古代文献学、古代文学史等,均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一些论著中,他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,从而使他以一位独具特色的史学家而卓立于中国学界。

抗战胜利后,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,亲自为胡适掌管北大扫清道路,尤其是将那些沦陷时期的北大任伪职人员全部开除。不久,傅斯年出国养病。1948年,他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发表《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〈史记集解〉跋》、《〈后汉书〉残

前

言

本跋》等重要论文,并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杨梅镇。

1949年1月20日,傅斯年就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,面对众说纷纭、杂言四起的台湾高等教育状况,他就各种弊端陋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并撰写了《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》、《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》、《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》、《一个问题——中国的学校制度》、《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》等文,阐明自己的现代教育理念。1950年12月20日,在台北台湾省议会上,傅斯年在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时,脑溢血症突发,于当晚11时20分病逝。享年55岁。

傅斯年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典型。他古今相通,本土与域外兼容,并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标准处世。用胡适的话说,傅斯年是“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他的记忆力最强,理解力也最强。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,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。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,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、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,往往带有爆炸性的;同时,他又是最温柔、最富于理智、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。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,而我们的孟真(傅斯年)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。”傅斯年一生著述甚丰,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集成《傅斯年全集》于2003年出版。我们编选的这本《傅斯年经典文存》,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,偏重于经学、史学和文学等方面,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。

编者于暨南大学

目 录

诸子天人论导源/1	目
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/8	录
墨子之非命论/17	
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/25	
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/34	
文学革新申义/43	
文言合一草议/54	
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/61	
中国古代文学史泛论/70	
诗部类说/102	
五言诗之起源/119	
泛论《诗经》学/127	
论所谓“讽”/140	
“诗三百”之文辞/147	I

夷夏东西说/167

战国子家叙论/221

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
社会的缘故/270

《史记》研究/280

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/294

傅斯年生平及著作年表/302

诸子天人论导源^①

古史者，劫灰中之余烬也。据此余烬，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，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。以不知为不有，以或然为必然，既远逻辑之戒律，又蔽事实之概观，诚不可以为术也。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，然若以或然为必然，则自陷矣。即以殷商史料言之，假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，文字器物不出土中，则十年前流行之说，如“殷文化甚低”，“尚在游牧时代”，“或不脱石器时代”，“殷本纪世系为虚造”等等见解，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，持论者虽无以自明，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。差幸今日可略知“周因于殷礼”者如何，则“殷因于夏体”者，不特不能断其必无，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“神话”中人于历史为例，设定其为必有矣。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，非本文所能试论，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，其文化必颇高，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，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。殷商文化今日可据遗物遗文推知者，不特不得谓之原始，且不得谓之单纯，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，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可知也。即以文

① 此文原系作者 1928 年在中山大学之讲稿，收入 1980 年 9 月台湾经联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二册。

字论,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,然能身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,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,决非两三百年来所能达也。以铜器论,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,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,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进,然后大量铜锡矿石来源之路线得以开发,资料得以积聚,技术及本地色彩得以演进,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。此两者最易为人觉其导源西方,犹且如是,然则殷墟文化之前身,必在中国东西地方发展若干世纪,始能有此大观,可以无疑。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见明确的中国色彩,绝不与西方者混淆,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长久矣。

殷墟文化系之发见与分析,足征殷商以前在中国必有不正一个之高级文化,经若干世纪之演进而为殷商文化吸收之。殷墟时代二百余年中,其文字与器物与墓葬之结构,均无显然变易之痕迹,大体上可谓为静止时代。前此固应有急遽变转之时代,亦应有静止之时代。以由殷商至春秋演进之速度比拟之,殷商时代以前(本书中言“殷商”者,指在殷之商而言,即商代之后半也。上下文均如此),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带中,不止一系之高级文化,必有若干世纪之历史,纵逾千年,亦非怪事也。(或以为夏代器物今日无一事可指实者,然夏代都邑,今日固未遇见,亦未为有系统之搜求。即如殷商之前身蒙亳,本所亦曾试求之于曹县商丘间,所见皆茫茫冲积地,至今未得丝毫线索。然其必有,必为殷商直接承受者,则无可疑也。殷墟之发见,亦因其地势较高,未遭冲埋,既非大平原中之低地,亦非山原中之低谷,故易出现。本所调查之遗址虽有数百处,若以北方全体论之,则亦太山之一丘垤也。又,古文字之用处,未必各处各时各阶级一致。设若殷人不用其文字于甲骨铜器上,而但用于易于销毁之资料上,则今日徒闻“殷人有册有典”一语耳。)且就组成殷商文化之分子言之,或者殷商统治阶级

之固有文化乃是各分子中最低者之一，其先进于礼乐者，转为商人征服，落在政治中下层。（说见“夷夏东西说”，“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”等。）商代统治者，以其武力鞭策宇内，而失其政治独立之先进人士，则负荷文化事业于百僚众庶之间。多士云“殷革夏命……夏迪简在王庭，有服在百僚”，斯此解之明证矣。周革殷命，殷多士集于大邑东国雒，此中“商之孙子”固不少，亦当有其他族类，本为商朝所臣服者，周朝若无此一套官僚臣工，即无以继承殷代王朝之体统、维持政治之结构。此辈人士介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，其幸运者可为统治阶级之助手，其不幸者则夷人皂隶之等，既不与周王室同其立场，自不必与之同其信仰。周初王公固以为周得天命有应得之道，殷丧天命亦有其应失之道，在此辈则吾恐多数不如此想，否则周公无须如彼晓晓也。此辈在周之鼎盛，安分慑服，骏臣新主而已。然既熟闻治乱之故实，备尝人生之滋味，一方不负政治之责任，一方不为贵族之厮养，潜伏则能思，忧患乃多虑，其文化程度固比统治者为先进，其鉴观兴亡祸福之思想，自比周室王公为多也。先于孔子之闻人为史佚，春秋时人之视史佚，犹战国时之视孔子。史佚之家世虽不可详，要当为此一辈人，决非周之懿亲。其时代当为成王时，不当为文王时，则以洛诰知之。洛诰之“作册逸”，必即史佚，作册固为众史中一要职，逸佚则古通用。《左传》及他书称史佚语，今固不可尽信其为史佚书，然后人既以识兴亡祸福之道称之，以治事立身之雅辞归之，其声望俨如孔子，其书式俨如五千文之格言体，其哲学则皆是世事智慧，其命义则为后世自宋国出之墨家所宗，则此君自是西周“知识阶级”之代表，彼时如有可称为“知识阶级”者，必即为“士”中之一类无疑也。（按：史佚之书〔其中大多当为托名史佚者〕引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墨子》者甚多，皆无以征其年代，可征年代者仅洛诰一事。《逸周书》克殷世俘两篇记史佚〔亦作史逸〕躬与杀纣之役，似为文武时

之大臣。夫在文武时为大臣，在成王成年反为周公之作册〔当时之作册职略如今之秘书〕，无是理也。《逸周书》此数篇虽每为后人所引，其言辞实荒诞之至，至早亦不过战国时人据传说以成之书，不得以此掩洛诰。至于大小戴记所言，〔保传篇，曾子问篇〕，乃汉人书，更不足凭矣。《论语·微子篇》，孔子称逸民，以夷逸与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并举。意者夷逸即史佚，柳下惠非不仕者，故史佚虽仕为周公之作册，仍是不在其位之人，犹得称逸士也。孔子谓“虞仲夷逸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”，果此夷逸即史佚，则史佚当是在作册后未尝复进。终乃退身隐居，后人传其话言甚多，其言旨又放达，不同习见也。“身中清”者，立身不失其为清，孟子之所以称伯夷也，“废中权”者，废法也，“法中权”犹云论法则以权衡折中之，盖依时势之变为权衡也。凡此情景，皆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所引史佚之词合。果史逸即夷逸一说不误。则史佚当为出于东夷之人，或者周公东征，得之以佐文献之掌，后乃复废，而名满天下，遂为东周谈掌故论治道者所相述焉。）

当西周之盛，王庭中潜伏此一种人，上承虞夏商殷文化之统，下为后来文化转变思想发展之种子。然其在王业赫赫之日，此辈人固无任何开新风气之作用，平日不过为王朝守文备献，至多为王朝增助文华而已。迨王纲不振，此辈人之地位乃渐渐提高。暨宗周既灭，此辈乃散往列国，“辛有人晋，司马适秦，史角在鲁”（汪容甫语），皆其例也。于是昔日之伏而不出，潜而不用者，乃得发扬之机会，而异说纷纭矣。天人论之岐出，其一大端也。

东周之天命说，大略有下列五种趋势，其源似多为西周所有，庄子所谓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”也。若其词说之丰长，陈义之蔓衍，自为后人之事。今固不当以一义之既展与其立说之胎质作为一事，亦不便徒见后来之发展，遂以为古者并其本根亦无之。凡此

曰非命论，分疏如下。

命定论者，以天命为固定，不可改易者也。此等理解，在民间能成牢固不可破之信念，在学人口中实不易为之辩护。逮秦汉既兴，民智复昧，诸子衰息，迷信盛行，然后此说盛传于文籍中。春秋时最足以代表此说者，如《左传》宣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：

成王定鼎于郊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

此说之根源自在人民信念中，后世所谓《尚书·西伯戡黎篇》载王纣语曰，“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”。此虽非真商书，此说则当是自昔流传者。《周诰》中力辟者，即此天命不改易之说。此说如不在当时盛行，而为商人思恋故国之助，则周公无所用其如是之喋喋也。

命正论者，谓天眷无常，依人之行事以降祸福，《周诰》中周公召公所谆谆言之者，皆此义也。此说既为周朝立国之实训，在后世自当得承信之人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多记此派思想之词，举例如下：

季梁……对曰，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（桓六年）宫之奇……对曰，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故《周书》曰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又曰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，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。’如是，则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凭依，将在德矣。”（僖五年）

“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生也。吉凶由人。”（僖十六年）

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，迄于天下。及其失之也，必有愆淫之心间之，故亡其氏姓。……夫亡者岂繄无宠？皆黄炎之后也。惟不帅天地之度，不顺四时之序，不度民神之义，不仪生物之则，以殄灭无胤，至于今不祀。及其得之也，必有忠信之心间之，度于天地，而顺于时动，和于民神，而仪于物则。……

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，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。（周语下）

举此以例其他，谓此为周人正统思想可也。此说固为人本思想之开明，亦足为人生行事之劝勉，然其“兑现能力”究如何，在静思者心中必生问题。其所谓贤者必得福耶，则孝已伯夷何如？其所谓恶者必得祸耶，则瞽瞍弟象何如？奉此正统思想者，固可将一切考终命得禄位者说成贤善之人，古人历史思想不发达，可听其铺张颠倒，然谓贤者必能寿考福祿，则虽辩者亦难乎其为辞矣。《墨子》诸篇曾试为此说，甚费力，甚智辩，终未足以信人也。于是俟命之说缘此思想而起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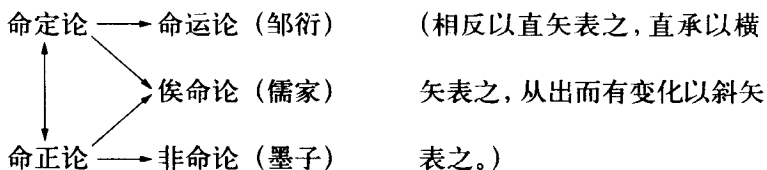
俟命论者，谓上天之意在大体上是福善而祸淫，然亦有不齐者焉，贤者不必寿，不仁者不必不禄也。夫论其大齐，天志可征，举其一事，吉凶未必。君子惟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（语见《召诰》），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（语见《孟子》）。此为儒家思想之核心，亦为非宗教的道德思想所必趋。

命运论者，自命定论出，为命定论作繁复而整齐之系统者也。其所以异于命定者，则以命定论仍有“淳淳命之”之形色，命运论则以为命之转移在潜行默换中有其必然之公式。运，迁也。孟子所谓“一治一乱”，所谓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，即此思想之踪迹。《左传》所载论天命之思想多有在此义范围中者，如宋司马子鱼云，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（僖二十二）谓一姓之命既讫不可复兴也。又如秦缪公云，“吾闻唐叔之封也，箕子曰，其后必大，晋其庸可冀乎？”此谓命未终者，人不得而终之也。此一思想实根基于民间迷信，故其来源必古，逮邹衍创为五德终始之论，此思想乃成为复杂之组织，入汉弥盛，主宰中国后代思想者至大焉。

非命论者，墨子书为其明切之代表，其说亦自命正论出，乃变

本加厉，并命之一词亦否认之。然墨子所非之命，指前定而不可变者言，《周诰》中之命以不常为义，故墨子说在大体上及实质上无所多异于周公也。

以上五种趋势，颇难以人为别，尤不易以学派为类，即如儒家，前四者之义兼有所取，而俟命之彩色最重。今标此五名者，用以示天人观念之演变可有此五者，且实有此五者错然杂然见于诸子，而皆导源于古昔也。兹为图以明五者之相关如下：



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^①

春秋时代之为矛盾时代，是中国史中最明显之事实。盖前此之西周与后此之战国全为两个不同之世界，则介其间者两三百年来之必为转变时期，虽无记载，亦可推想知之。况春秋时代记载之有涉政治社会者，较战国转为充富，《左传》一书，虽编定不出于当时，而取材实为春秋列国之语献，其书诚春秋时代之绝好证物也。（《左传》今日所见之面目自有后人成分在内，然其内容之绝大部分必是战国初年所编，说别详。）春秋时代既为转变时代，自必为矛盾时代，凡转变时代皆矛盾时代也。

春秋时代之为矛盾，征之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者，无往不然，自政治以及社会，自宗教以及思想，弥漫皆是。其不与本文相涉者，不具述，述当时天人论中之矛盾。

春秋时代之天道观，在正统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权性，又以其在周诰后数百年，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论。试看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几为鬼神灾祥占梦所充满，读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际。彼自言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，则正是殷商卜辞之内容也。此诚汪容

① 此文原系作者1928年在中山大学之讲稿，收入1980年9月台湾经联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二册。